

人生沉浮录

历史再 审判

当代名家手笔
当代名人纪实

柳 萌 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历史再审判

柳 萌 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年7月

(川)新登字 001 号

特约编辑:李 涛
责任编辑:汪伊举
封面设计:梁 伟
技术设计:古 蓉

·人生沉浮录·(下)

历史再审判

柳 萌 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成都市锦文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2.5 字数 314 千

1996年7月第1版 1996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3180-7/1·463 印数:1-20000

每套(两册) 定价:35.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功臣的悲剧

——记潘汉年和董慧 …………… 王朝柱(1)

建国后的一大政治案件“潘案”曾株连无数，牵动了多少人的心，而当事人——上海市第一任副市长即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同志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潘汉年和夫人董慧的曲折经历却鲜为人知，本文将之呈现给读者，相信你读后会为他们的忠贞而感动。

政治风浪中的胡乔木…………… 叶永烈(71)

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的胡乔木在庐山会议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中大力纠“左”，开始了他动荡的政治生涯。作为“一介书生”的胡乔木与毛泽东、江青间的曲折的故事，胡乔木的政治阅历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

我的母亲彭子冈 …………… 徐城北(119)

这位国内外知名的中国女记者，少女时就以其才华在全国崭露头角，成为记者后先后采访过史良、冰心、宋美龄、毛泽东等名人，后又创办著名的《旅行家》杂志，只因敢于直言而被划为极右分子，直到新的历史时期，才还她公正。本文描绘了子冈的这些阅历，同时又从儿子的角度，回忆了母亲对儿子的爱和情。对一生多难的已离开人世的母亲，发出了“我那可思可叹，可歌可泣的母亲哟！”的呼唤声！

我和乔冠华的风雨十年 …… 章含之(207)

章含之因帮毛泽东学习英语，被称为“章老师”。“章老师”调到外交部工作结识了乔冠华，拉开了她和乔冠华的生死之恋，等待他们的是十年风雨、十年磨难、十年的辛酸和苦涩。文章向读者介绍了章含之和乔冠华相识到相知的经过，也讲述了他们生活中的许多细节。

命运的选择和选择的命运 … 胡 健(237)

他由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指引而参加革命，认识了黄华、丁玲，见到了党的领袖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接受党的指示当了国民党陆军上将卫立煌的高级秘书，为党

作了许多工作。命运选择了他去参加革命,可他不能选择命运。在1950年后,他先后被戴上“反党分子”、“右派分子”的帽子,并送下农村劳动改造。最后,还是历史的再审判,使他的“反党分子”帽子被摘掉,他的党籍被恢复……

梦回荒原——

“右派”生活片断 …………… 王 正(332)

他1958年启程去北大荒不是一次光彩的旅行,而是作为一名右派分子遣送到那里去劳动改造。描写了从1958年到1961年间,他在北大荒的日子,在那里有诉不尽的苦难,同时又有解不开的情结,成为他后来一些创作的题材来源和感情源泉。

青春童话 …………… 张 仲(350)

作者说:“我应该有美丽、健旺、喜悦的青春。”但是,他的青春是在劳动教养队度过的,因为他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对象;他在艰难时期结了婚,可儿子是个哑巴,作者不能不对天发问:青春,你是童话吗?

功臣的悲剧

——记潘汉年和董慧

王朝柱

前 言

潘汉年同志是我党历史上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杰出人物。他不仅是一位秘密战线上功勋卓著的不屈战士，同时又是一位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贡献突出的优秀代表。

然而，潘汉年同志充满英雄色彩的革命斗争历史，却在一段时期人为地颠倒了。一夜之间给他强加上了“内奸”、“特务”、“反革命”等莫须有的可怕罪名。由于所谓“潘案”自始至终都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所以使得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子——潘汉年同志遂由传奇而变为神秘了。

而这部《功臣的悲剧》，就是写潘汉年同志作为时代的功臣进驻上海，出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进而罹难入狱，长达二十余年，并惨死在劳改茶场的全部内情经过……

(一)

潘汉年生于1906年，故乡宜兴素有“文化之乡，教授摇篮”之美誉。潘氏是宜兴陆平村的望族大户，三代人有功名。辛亥之后，其父潘萃华弃学从政。不久，因涉足政坛，染上吃喝之风以及吸食鸦片等恶习，遂家道中落，入不敷出。这就是潘汉年自称出生在“没落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的原因，也正是这种书香遗风的熏染、父亲的严教，为潘汉年打下了较好的旧学根底，使之在未成年之前就能写一手好文章，能熟练地驾驭古体诗词歌赋的写作。

潘汉年的亲生母亲叫巫大宝，是父亲的小妾。因此，潘汉年虽然在潘家行三，却是为妾的母亲的长子。他母亲那种“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的品质，一直影响着他的成长。同时，为妾的母亲那种特有的畏首畏尾，忍气吞声，不敢冒犯一家之主的性格弱点，也为潘汉年的悲剧性格植下了一颗不敢犯颜直谏的种子。

潘汉年在五四风潮的冲击下走出宜兴，进入上海，自称是“创造社的小伙计”。八一南昌起义失败之后，根据党的指示，他又发动并成立了“左联”；不久，顾顺章叛变，他受命参预重组中央特科，和国民党特务周旋在隐蔽的战线上；他进入中央苏区，出任宣传部长，旋即又参加了长征；遵义会议一俟结束，遂和陈云同志相继赶往莫斯科，向第三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接着，他又奉命回国，参加国共合作的秘密谈判，历经一年半的努力，终于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自抗战爆发后，潘汉年一直在敌后领导情报工作，成功地谱写了一部党的情报史，为人民建立了特殊的功勋。期间，他结识了助手董慧同志，几经坎坷，终结为伉俪。1949年4月，他自香港奉命北上，接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新的工作安排，遂把爱妻董慧同志留在香港，悄然登上了北去的“东方号”客轮。

乘坐“东方号”轮船的旅客除去潘汉年、许涤新、夏衍和其女儿阿咪之外，还有达德学院的一位副教授及其夫人和两位年轻的越南女青年。潘汉年和夏衍父女住在一起，许涤新同达德学院的教授夫妇住在一起。

大海的风光是壮丽多姿的。但是，海上的旅途生活却往往是单调乏味的。为了把这单调乏味的旅途生活变得活泼起来，每日三餐过后，待其他几位同行的旅客回卧室休息，潘汉年就与许涤新、夏衍留在餐厅里，一面望着餐厅外面的海天景色，一面讲起故事来了。自然，主讲人是潘汉年。讲的内容是：“上海地下时期的反特斗争；长征途上的见闻；30年代对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化上的反围剿，等等。”

说到遵义会议，潘汉年又对夏衍和许涤新说：“我就是在遵义会议后一个月左右离开长征队伍的。是闻天同志找我谈的话。他还亲自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遵义会议后，考虑到今后的军事行动将更为艰难和严峻，中央曾考虑将党中央机构转移到南洋地区去活动，但没有定下来。”

“为什么没有定下来？”许涤新同志问道。

“因为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他说：指导中国革命在莫斯科不行，在南洋地区更不行，只能在中国大地上，在工农红军中。”

夏衍和许涤新赞同地点了点头。接着，潘汉年叹了一口气，万分感慨地说：

“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我们的党中央真的迁到了南洋去，想想看，今天的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潘汉年一行自4月28日离港，至5月4日傍晚驶抵塘沽，一共在大海上航行了七个昼夜。由北平特意赶来的冯弦同志把潘汉年一行带到海关俱乐部，吃过晚饭后，就近在一家破旧的招待所住了一夜。翌日清晨，乘汽车穿过崎岖不平——留有战争伤痕的公路驶抵天津，住在睦南路的原美军招待所。次日，乘火车到达决定改

名的北平——北京。下了火车，冯弦同志径直把潘汉年一行带到弓弦胡同15号李克农同志的住处。一见面，李克农就和潘汉年、许涤新、夏衍三位老战友紧紧握手，坐下来，就大谈他三次到北平的不同处境：

“第一次是在地下工作时期，我是化了装，小心翼翼进入北平的；第二次是在1945年冬到1946年夏，我是以军调部的中共代表的资格，进入北平的，那时候我同国民党人员几乎是天天见面，经常争得面红耳赤；第三次就是北平的和平解放，我是以主人翁的资格进入北平的。革命在前进，局势在改变，这是谁也阻挡不住的。”

对此，潘汉年更有感慨！潘汉年第一次光顾北京是在1925年夏天，送他表妹到北京读书，留下了美好的初恋印象；第二次到北平是在1944年11月，他奉命赴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途经北平中转，因未和接头人联系上，匆匆南返上海，走另外一条交通线安抵延安；第三次到北平是1946年，那是因为他和董慧在沈阳无法立足，来北平军调部找李克农同志联系工作的；这次和许涤新、夏衍由香港来北平，是听取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接管即将解放的上海的意见的。这对一个从事情报工作——常年在地下同敌人周旋、战斗的同志而言，从此由隐蔽转为公开——并以主人翁的身份领导人民改造旧社会，建设新中国，其兴奋的程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潘汉年一行在李公馆过了一夜。次日，李维汉和廖承志等同志接踵而至，老友相见——应该说是胜利重逢，自然相谈甚欢！当他们见潘汉年一行从香港带来的芒果，大叫“好东西！”笑嘻嘻地各自把芒果装进口袋而去。

第二天，潘汉年一行离开弓弦胡同李公馆，搬进北京饭店三楼。潘汉年住的是303号房间，许涤新和夏衍住在隔壁，可能是304房间。潘汉年是他们三人的领导，肩负着和中央的联系。对此，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所说：“过了一天，汉年就初步拟定了一个

日程。”至于今后活动的详情，许涤新记入遗著《艳阳照方地》中。为借墨存史——并征得许涤新的亲属的同意，现转抄如下：

记不起是哪一天(大约是九日)的傍晚，我在北京饭店三楼304室看完日报之后，正在沙发上休息，忽然床头的电话响了。汉年通知我：“总司令今晚要请我们吃饭，你马上过来；至于老夏，我已派车去接他了。”我到老潘的房子时，克农同志已在旁，接着总司令就来了……他一进门，汉年给我们介绍，他就用相当浓重的四川口音，慈祥地对我们说：“你们的名字，我早就知道，因为你们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南方局向中央的工作报告中，也经常提到你们。你们在白区奋斗，是辛苦了；现在全国快要解放，更需要你们继续努力。”他在北京饭店请我们几个人吃了一顿很好的西餐。总司令对人很和蔼，从他的举止，看不出他就是名震全球、叱咤风云、指挥百万大军的伟大名将。席间大家并不拘束，而是谈笑风生，特别是克农同志，说了不少笑话，引得大家开怀大笑！……

十一日晨，恩来同志的秘书通知我们三人到当时设在后圆恩寺胡同的华北局，列席会议。这次华北局的会议是由恩来同志主持的，主题是听取刘少奇同志在天津对资本主义工业的调查报告和对几个大资本家的统战工作的经验总结。在少奇同志讲话之前，恩来同志叫汉年报告了三年来在香港工作的情况；夏衍同志做了一些补充。恩来同志问我：“你还有什么话说？”我说：“我们在港的资金不多，不能大数量的进货，因而展不开！”他把我的“大数量”三个字，听成“打苏联”。他大笑起来问我：“为什么要打苏联？”汉年纠正我的发音。恩来同志对我笑着说：“你住了三年香港，连普通话也退步了，真是想不到的事。难道广东人就讲不好普通话？全国快要解放，你要做更多的工作，普通话说不好，对工作是有影响的啊！”接着少奇同志便讲了他的天津之行，

讲得很生动，对工商界的统战工作，讲得很深刻。

恩来同志在次日通知我们，要在当天夜里到颐年堂谈工作。那时，毛泽东同志还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他进城之后，恩来同志才搬到西华厅办公。那天晚上，我们吃饭后就到颐年堂去，工作人员把我们三人安排在右侧的会客室等候。那时，恩来同志正在北屋中间的会客厅同总司令和彭德怀、贺龙诸同志谈话，一直到十时以后，才叫我们到北屋去。恩来同志对接管上海的工作，作了很具体的指示。他强调：“要在思想上有准备，准备停在黄浦江上的英美舰队向我们开炮，准备国民党的破坏，准备上海全市断水断电，准备各种意料之外的困难。一面要准备最艰难的处境，一面要争取良好的局面。你们要把我的这个意思，告诉陈总。”他并告诉我们，中央决定汉年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并兼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治和统战工作；夏衍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长，负责接管文教系统的工作；我则任上海市委委员，主要任务是协助曾山同志搞好财经方面的接管工作。谈到凌晨，才把我们送到北京饭店。因为疲劳过度，我的精神不集中，把眼镜丢在床上就睡着了，次日起身发觉眼镜的一块玻璃片被压碎了。原想吃过饭后就到东安市场的眼镜店配镜片，但是，杨尚昆同志和几位老同志，其中有陈沂，先后来我们，无法走开；并且接到通知，下午要上山去看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同志。只好借阿咪的眼镜，暂时使用。

下午二时左右，由王拓同志陪同我们上香山。龚澎刚从香港来，改穿了解放军军装，要求同我们一道上山……我们首先到双清别墅，毛泽东同志接见我们。因为在重庆谈判时龚澎当过他的翻译，他看到龚澎如此装饰，笑着说：“你穿上军装，不是变成一名男子汉吗？是不是？”汇报香港工作，主要是由汉年说的。毛泽东同志边听边点头。当时正是英国紫石英号在南京肇事之后，所以他问起港英当局对我们的态度。我们回答，在国共和谈破裂之

前，港英当局有一种“划江而治”的幻想，所以他们想尽办法，要把李任潮留在香港；后来我军大举渡江，直接解放了南京，他们的态度有了一些改变，我们公开举行庆祝南京（解放）的酒会，他们不但没有干涉，而且让一些“太平绅士”也来参加。毛主席笑着说：“英国人比美国人老练，他们是不会把路走死的。现在我军乘胜追击，上海已在我们的包围之中。”我们请他指示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他说：“总的方针，中央已给陈、饶发了电报，重要的一点是不让国民党搞焦土政策，尽可能完好地保存这个现在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至于具体的政策可以按恩来同志给你们指示办理。”毛主席情绪很好，在谈了总的指示之后，又对各人谈了几句。他问我：“你不是劳动大学学习培基的学生吗？”我答：“是。”他又说：“你们三人都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可以说是老上海了，应该把接管工作做好啊。”我刚上香山时，心里有两种感觉：一是高兴毛主席能接见我们；二是担心毛主席会提出一些我们回答不了的问题。但是，经过一个多小时谈话之后，这种紧张的情绪就消失了。

在香山，我们吃夜饭时，除总司令之外，还有贺龙同志。我对贺帅说：“你和叶挺同志的起义大军，进入潮汕虽只有一个星期，但是，潮汕人民特别是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是永远在怀念恩来同志和你们的。”贺帅问我：“你是潮汕人吗？”我说：“是。就是因为我是潮汕人，我才敢说这句话。”贺帅口含烟斗，态度极其潇洒。这一次夜餐，吃的还是西餐。

潘汉年等三人在北平的一个星期里，除去向党的领导汇报工作、接受接管上海的指示以外，还要拜会从香港到解放区来的民主人士以及知名的艺术家，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潘汉年一行于五月下旬乘火车经津浦线南下。诚如夏衍所说，这时已经不止我们三人，而是一支“队伍”了。其中还有毛泽东的长

功臣的悲剧

子毛岸英，化名杨秘书。翌日下午，车到济南，时任山东省省长的康生等人在车站迎接。他和潘汉年、毛岸英热烈拥抱，并尽了地主之谊。这时的康生已在中央失去昔日的威风，被“下放”到山东工作，直到一九五八年东山再起。因此，建国后“潘案”和他无关。某些专著说是康生捣的鬼，与史实不符。

潘汉年一行继续南行，“车到南京，刘伯承同志接待我们三人。”因为战事刚结束，铁路还来不及完全扫清障碍，“火车越向南走，故障越多，停停走走，直到23日傍晚才到丹阳。杨帆带了一批人来迎接我们”。“他把我们三人安顿在一处临时招待所。”

次日一早，杨帆引潘汉年、夏衍、许涤新到“三野”会议室去看陈毅同志。刚好“二野”、“三野”的领导同志正在开会。就座的有邓小平同志和蔡裕、宋任穷、曾山、刘晓、刘少文等同志。饶漱石说是害了感冒，戴了一顶黄色军帽也坐在会议室的中间。而陈毅同志正伏在一张方桌子上签署“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号布告”。诚如许涤新同志所回忆的：布告是相当大的一张纸，印着头号字。他用金笔写了陈毅两个字。刘晓同志向他介绍我们的时候，他同我们一一握手，笑着说：“你们几位香港客，终于赶到了。等了你们好几天了。好在你们都是老上海，用不着向你们介绍上海情况。”陈毅同志光着头，手拿一把蒲扇，边扇边说，“你们刚从北京来，接管上海的政策方针，人事安排，你们该已知道了。中央对你们有什么新的指示，倒想听一听。”那时，会已开完，大部分人散去了。“汉年向他汇报毛主席和恩来、少奇同志对我们的指示。谈了不到一小时，紧急电话几次向他请示”。他站起来说：“你们先去休息吧，刚才聂凤智来电话，明天就要开拔。”

潘汉年和陈毅同志自在中央苏区相识以来，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尤其是在淮南黄花岗新四军军部那一段时间里，潘汉年十分敬重陈毅同志处变不惊的恢宏气度，以及容忍饶漱石和不明真相的部属进行非难的雅量。也可能是所谓的文人习气在作祟吧，潘汉

年对陈毅同志的诗才、口才更是折服。换句话说：陈毅同志就是潘汉年心目中的儒将的化身。所以，当他接到中央电令要他佐助陈毅同志接管上海、改造上海以后，那句“士为知己者死”的左语，立刻浮现在他的心头。因为他认定自己能在陈毅的麾下施展自己的才华了！所以，他的内心中有着一种“知遇”之情的满足感。今天，他终于又见到久违——而又时在念中的一代儒将陈毅同志，他的第一印象依然是那样的热情、风趣，丝毫没有一点“功臣自居”的样子，他也就越发地敬重陈毅同志了。或许是在王明、康生、饶漱石等人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太久的缘故，时下能在陈毅同志的属下供职，有着他人难以理解的幸运感。他汇报完工作之后，又习惯地说：

“请首长指示。”

“我哪里是什么首长？只有党中央和毛主席才能作指示。”陈毅同志把脸色一沉，十分严肃地说，“小开同志，我们的地位无论发生了什么变化，都不要忘了是同志，是既能同甘也能共苦的同志！”

陈毅同志十分欣赏潘汉年的组织才能，也深知潘汉年在情报战线上作出的特殊贡献。或许是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所谓的人文气质，而且还有着受饶漱石政治迫害的经历等缘由，陈毅同志对潘汉年是相当器重的。当然，知人善任的陈毅同志，也清楚地知道潘汉年的弱点，对如何完成党中央交给的接管好上海的历史使命，说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上海是个好地方，又是一个烂泥坑，花花世界，是冒险家的乐园。乡下人进城，会眼花缭乱的，你们得分出点时间来，分别对你们分管的干部讲讲上海的情况。凡是要注意、要提防的事情，你们讲比我去讲好，你们有感性知识。”

拜会陈毅同志之后，潘汉年那种难以抑制的胜利者的喜悦之情，旋即又被如何接管好上海的重任所取代，遂又变得深沉起来。他依据“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古训，又沉入到更为艰巨、复杂的思索中去了。

接着，潘汉年见到了久违的扬帆。这位“怪癖才子”虽然多了几分老成，但一开口说话，依然像过去一样立场坚定，精力过人。当潘汉年获知扬帆将和自己共同进入上海，并在自己的属下负责公安保卫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内心都是非常高兴的。然而，他们二人谁也不曾想到——深夜做梦也不会梦到五年之后，他们的命运悲剧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成了震惊中外的冤案——潘杨反革命集团。再说扬帆，他见到久违的“恩人”——未来的顶头上司潘汉年未及交谈，就又公事公办地引潘汉年来到华东军区政委、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的办公室。

虽说饶漱石在淮南主政的时候对潘汉年不满，又利用职权整了潘汉年，但他同时知道潘汉年是个人才，很受中央领导人的器重，就不能不重视和他搞好关系。何况现在，饶自己在当上了华东局第一把手之后，正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潘汉年是个用得着的人才，因此不能怠慢。他已经安排好并请示中央同意，要潘汉年除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和上海市军管会秘书长等行政职务外，又在党内安排他担任华东局委员、社会部长、统战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长等职。饶漱石确是想倚重这位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他对潘汉年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潘汉年对饶漱石的成见很深，再加上他那疾恶如仇的性格使然，他的心情绝没有和陈毅同志相见时的愉悦。但是，他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党的纪律和他的修养，使他不得不把这种私人成见藏在心底，为了革命的大业主动地协调好上下级的关系。他寒暄过后，遂理智地把毛泽东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所指示的内容，向饶漱石一一作了汇报。

翌日清晨，潘汉年被通知到陈毅同志那里去开会。“今天，他脱下了习惯穿的西服，换上了刚刚发给他的一套新军装。又将配给他的一支新手枪挂在腰间的皮带上。这虽然给他增添了几分军人的威武，但文人的气质却并没有多少改变。”陈毅同志在会上讲话，首

先宣布今天下午就要离开丹阳向上海进发，各接管组将分批乘火车走。接着，他再次重申了“各项入城纪律和规定，并以军事首长的语气命令所有接管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最后，他再次谆谆教导：

“同志们！一切都要事先请示、事后报告，不懂的事情不准乱来，接管方面的具体事情一律听潘副市长的指示！”

从这次会议开始，潘汉年作为上海市副市长走马上任了。自然，也就成了陈毅市长的名副其实的助手。

次日——5月27日，是上海解放的日子。一百多年以来，被帝国主义列强所侵占、所奴役，并把它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桥头堡上海，终于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里！在胜利的会师中，潘汉年认识的人最多，同他握手和拥抱的人，可以说是数不清的，因为不少干部过去是通过他而进入解放区的。

潘汉年于胜利会师的喜悦中，时刻没有忘记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交给自己的重任——协助陈毅同志接管好上海。他深情依依地望着那熟悉的鳞次栉比——带有明显的殖民色彩的不同风格的建筑，他那双熠熠闪光的眼睛猝然之间湿润了，模糊了，他似乎看到了自己在上海留下的各种足迹……不知何故，他的耳边又突然响起陈毅同志的说话：“上海是个好地方，又是一个烂泥坑，花花世界，是冒险家的乐园。乡下人进城，会眼花缭乱……”潘汉年镇定了一下情绪，近似宣战暗自说：

“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把东方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变成一座新型的人民的城市！”

(二)

潘汉年是一位熟知中外历史的共产党人。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秦始皇这样功盖千秋的始皇帝，他终生所开创的业绩又几乎毁在自己的手中；一度威名赫赫并亲自统率国民革命军打天下的蒋介石